



[隋唐]崔致远与阿倍仲麻吕——从古代朝鲜、日本与“中国化”的关联来看

川本芳昭

来源: 中日文化交流集刊

投稿人: 董科

发布时间: 2008-7-12

阅读次数: 355

前言

众所周知,崔致远是朝鲜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在新罗时代入唐并科举及第,在之后的“黄巢之乱”时进入高骈幕下,以授命执笔《檄黄巢书》等活动而活跃于当时的政治舞台,在史上有“朝鲜汉文学之鼻祖”、“东海之文宗”之美誉。阿倍仲麻吕则是在唐玄宗时代作为遣唐使的一员与学问僧玄昉等一同入唐,在那里做官直至逝去的人物,他以《古今集》羁旅歌收录的“仰望遥远的天空……”的望乡歌[1]而广为世人传颂。

2001年8月,笔者在山西大同召开的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七届年会上,做了题为《汉唐间“新”中华意识的形成——五胡、北魏同古代日本、朝鲜的关系》的报告。[2]报告指出,古代日本受中国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意识;古代朝鲜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也存在同样的动向并且先于日本;最后指出,中国史上五胡各国时期形成的中华意识是所有这些动向的先驱,等等。

本稿继上次报告,紧紧围绕上述历史现象中出现的古代日本和朝鲜(统一新罗)史上两个著名人物,试图弄清古代日本和朝鲜的中华意识在魏晋南北朝以后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并展开的。

如上所述,崔致远科举及第之后作为唐王朝的官员活跃于当时的政治舞台。那么当时,崔致远在对自己而言完全是异国他邦的唐朝出仕为官、积极活动,是受到了何种意识的支配?阿倍仲麻吕也官至秘书监、卫尉卿,在他的思想里两种中华意识是怎样并存的呢?仲麻吕虽然也同崔致远一样科举及第,作为唐王朝的官员活跃于当时,但是,关于二者的相似之处的历史考察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管见所及,在日本,经科举及第成为中国王朝的官僚而活跃的人物仅仲麻吕一人。可是,在朝鲜则不仅只崔致远一人科举及第,另有为数众多的及第者——不仅仅在唐代,直到元明时期都有及第者。朝鲜与日本对于科举制度的接受有着对比鲜明的不同,那么,这是基于什么原因呢?

抱着这些疑问,笔者通过比较经魏晋南北朝而形成该种中华意识的古代日本和朝鲜,指出,虽然在唐朝以后也不能忽视作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体制的朝鲜和作为东亚中心的中国,但是,试图从该种体制脱离出来的日本存在着与之不同的特点。从隋唐中国变质而来的日本或朝鲜的国家主义的高涨,影响了后世对崔致远、阿倍仲麻吕的评价,笔者在此一并指出该种边缘对照的存在。

一、崔致远及第仕唐之内外部因素分析

现今流传的崔致远文集《桂苑笔耕》卷十七“七言纪德诗三十首·谨献司徒相公·兵机一”条里有“惟将志业练春秋,早蓄雄心划国讎,二十年来天下事,高枕倚留侯”之句,在此能见到崔致远使用了“天下”一词。从文义上可以明了此处的“天下”是指中国或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

此外,《桂苑笔耕》的序言里亦有李朝时代洪奭周“吾东方之士,北学于中国,而以文声天下者,亦自崔公始”一语。此处的“天下”不必赘言亦指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然而,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的古代日本——倭国——即五世纪雄略天皇时候的铁剑有如下铭文:

辛亥年(471)七月中记。乎获居臣……世々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支鹵大王寺,在斯鬼官时,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炼刀,记吾奉事根原也。

熊本县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刀铭文有如下内容:

治天下获□□□鹵大王世,奉事典曹人无利弓。八月中……

此处的“天下”是指倭国的领域,或指以倭国为中心的世界,以上两者所指的“天下”于此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一方面对朝鲜人来讲朝鲜是被包含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中,另一方面在倭国则自认为是已经独立于中国的世界中心,主张以倭国为中心世界的存在。[3]

在此,如果说古代朝鲜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完全不怀有这种以自国为中心的天下思想的话也是不妥当的。因为,《续日本纪》卷十二“天平七年(735)二月癸丑”条云:“新罗国辄改本号曰王城国,因兹返却其使。”这一国号明显地有如《三礼图》“王城”条中所见到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祖,面朝后市。贾释注云,营谓丈尺大小,天子十二门”那样,出自“天子王城”的中华思想。虽说新罗统一后的朝鲜尽管是中国的册封国,但是朝鲜在对“祭天仪礼”的存在方式上明显地将其中华思想以曲折的方式表露了出来。[4]

可是，科举及第做了唐王朝官僚的崔致远在《桂苑笔耕》卷二十“新罗探候使朴仁范员外”条里对新罗使节的到来写到：

忽奉公状，倍睹忠诚……今者仰恋圣朝，远銜王命，捧琛探贄，栈险航深，能献款於表章……况国大王，特致书信相问。将成美事，不惜直言。

从这里可以看出，做了唐王朝官吏的崔致远至少在表面上将做为自己主人的新罗王或者做为祖国的新罗摆在低于中国皇帝和唐王朝的位置上。当时崔致远的思想意识具体如何虽然不得而知，但是《桂苑笔耕》卷十八“长启”条里说道：

某东海一布衣也。顷者万里辞家，十年观国。本望止於榜尾科第，江淮一县令耳。前年冬罢离末尉，望应宏词，计决居山，暂为引退。学期至海，更自琢磨。俱缘禄俸给无余，书粮不济。辄携勃带，来扫膺门。岂料太尉相迓垂奖怜，便署取……特赐奏荐，重言天应，忝获超升……某自江外一上县尉，便授内殿宪秩，又兼章绂。且见圣朝，簪裾煊赫子弟出身入仕，二三十年，犹挂蓝袍，未趋莲幕者多矣。如某异域之士乎……但恐买戎狄之笑，沾史传之讥。昔汉朝金日磾，常在武帝左右。帝欲别加宠遇。日磾曰：“臣外国人，且匈奴轻汉。”

在这里，崔致远自我卑称“东海一布衣”或“异域之士”。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自己比做西汉时归顺中国的匈奴金日磾。同样的记载在崔致远的文集《桂苑笔耕》随处可见，同书卷十九“贺除礼部尚书别纸”条有“况是万里远人……某跻忝诸生，身拘倅职”之句，在这里，他自称是“万里远人”。同书卷十九“客将书”条云：

某腐芥无依，断蓬自役，长走而未离土，独行而转困路歧……伏蒙将军念。某来自异乡，勤於儒道，曲垂提挈，得遂献投，指喻情深。

同书卷十七“初投献太尉启”条又云：

某新罗人也。身也贱，性也愚。才不雄，学不赡。虽形骸则鄙，年齿未衰。自十二始别鸡林……。

在此，他表白自己是出身卑贱的新罗人。崔致远为何如此谦卑？我想这是因为当时存在着使崔致远不得不自我卑称的背景。关于这一背景，《桂苑笔耕》“长启”条继匈奴金日磾的话道：

某今日之请，实在於兹。诸厅郎官，早陈公议，盖以贱无妨贵，欲令夷不乱华。某伏自前年得门下，更无知识。唯谒诸厅幕中垂情，幸而获宥。窃聆太尉相公去年夏顾问某之时，诸郎官同力荐扬，和之如响，遂沾遽窃殊荣。昨者继陈说言，不徇尊旨。实乃惜太尉相公之名望，存淮南藩府之规仪。事体不亏，禪赞斯在。冬末而奉处分，欲使别开院宇。虽承恩诺，转切忧怀，何者……

同书卷十九“与客将书之一”条又道：

但某无媒进取，有志退居。以诗篇为养性之资，以书卷为立身之本。却缘虽曾食禄，未免忧贫……况家遥四郡，路隔十洲。穷忧则终夜煎熬，远信则经年隔绝。时情冷澹，俗态浇讹。买笑金则易求，读书粮则难致。天高莫问，日暮何归。始知学者之心须托至公之力。今幸遇相公，山包海纳，雨润风行。有片言可奖者，称誉出群，有小技可呈者，随才入用。是以无一物不归美化，无一夫不荷深思。然则举中国之人，咸承煦育。岂可令外方之士，独见弃遗。某不揆庸才，敢投清德。岂料将军垂拯拔，每赐吹嘘……小子之升沈进退，只在恩私。

从这段史料里我们从这里能够如实地看见一位始终意识到自己是个无亲无靠的外来人的无奈的崔致远。但是，同书卷十七“初投献太尉启”里“某新罗人也。身也贱，性也愚。才不雄，学不赡。形骸则鄙，年齿未衰。自十二始别鸡林……”的记述值得注意。这是因为，我们能够从这里看出崔致远在把新罗看做是一东夷的唐人面前敢于自我突出是新罗人，逆唐人之蔑视而反以新罗人深为自负。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的缔造者羯族出身的石勒，在《晋书》一〇四卷《石勒载记》中给汉族出身的刘琨等的书信中对自己作了“事功殊途，腐儒所闻。君当不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遗名马珍宝，厚宾其使，谢归以绝之”的介绍。诚如同载记里晋末群雄之一的王浚（汉族出身）心怀僭逆之心时的记述：

时王浚署置百官，奢纵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观察之……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齐珍宝，奉表崇浚为天子曰……。

本来自己抱有“吞并之意”，却对王浚隐瞒真意，诡称“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在此，将一群雄石勒的话同一文人崔致远的话做单纯的对比，原须慎重。作为群雄暂露头角之前的石勒，是在受汉族歧视的过程中形成人格的，而崔致远是在少年时代怀抱着在中国及第的目的来到中国的，他在其后经历了作为异邦人的长守苦节。将这两者敢于在汉人面前斩钉截铁自称夷狄的意识构造[5]进行比较，也不至于偏颇。关于崔致远在唐期间遭遇如何，在中国的史籍里的记载微乎其微。《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里仅有的“崔致远四六一卷，又《桂苑笔耕》二十卷。高丽人，宾贡及第，高骈淮南从事”的记述，可以说是最为清楚的记录了。但是，在摹仿中国的《文选》、李氏朝鲜前期编纂的所谓朝鲜汉文学的集大成《东文选》中，新罗人的编入作品多达192篇，而其中崔致远的作品占146篇之多。可以说，这一点也清楚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不同。

二、阿倍仲麻吕是否科举及第？

杉本直治郎在竭其毕生的巨著《阿倍仲麻吕传研究 朝衡传考》中论述道：

从学生生活步入官吏生活的关口即是所谓的科举。特别是当时的进士及第对官吏来说就是跳龙门。有“名成太学，官至客卿”之誉的朝衡，以优异的成绩闯关夺隘是可以想像的。否则，外国人怎能从众才子中脱颖而出、成为储光羲诗中所谓的“校书”且“高驾仕春坊”、迈出日后飞黄腾达的官吏生涯的第一步呢？……太学毕业后即做为所谓“生徒”，拥有参加官吏录用考试的资格。因有了这一资格，他一定是报考科举科目中最适合自己而且最有前途的进士科且合格。于是有如储光羲所言，做了“校书”之官。[6]

认为阿倍仲麻吕在唐朝通过科举、进士及第。以后，这一说法成为定论。最近，砺波护在《隋唐的佛教和国家》中论述道：“阿倍仲麻吕根本没有在乎作为外国人的不利条件，科举上进士及第，步入高升之路，成为玄宗信任的大臣级官吏秘书监。他回国的愿望未能实现，在唐50余年最终埋骨异乡，而吉备真备等18年后归故里。”[7]。王勇在『唐から見た遣唐使一混血児たちの大唐帝国』里称：“当时不满20岁的青年仲麻吕入唐后，有如王维在诗里歌颂的‘名成太学，官至客卿’那样，进入太学后科举及第，步入了高升

之路。”[8]可见，杉本直治郎的观点得到多数研究者的赞同。其实，上述观点的根据在于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五“延久四年(1072)十二月二十九日”条里的记载：

二十九日天晴。於梵才三藏房、见齋然法桥并寂照大师来唐日。即借取，书取《杨文公谈苑》如右：公书，雍熙初（九九四），日本僧齋然来朝，献其职员令、年代记。齋然依录自云，姓藤原氏，为真连，国五品官也……尽有日本年代记一卷及齋然表启一卷……案日本倭之别种也……开元中有朝衡者，太学应举，仕至补阙。

在这里看到的杨文公（即杨亿）的《谈苑》是《说郛》卷二十一中所载的《杨文公谈苑》的逸文。《说郛》称：“杨文公谈苑，十五卷，宋黄鉴纂集。故翰林杨文公大年（字），在真宗朝掌内外制，有重名，为天下学者所伏……杂抄广记，交错无次序。好事者相与名曰谈丛。予因而撮去重复，分二十一目，勒成十五卷，辄改题曰杨公谈苑。中书后阁宋庠序。”因为完成序文的宋庠在宋真宗之后的仁宗天圣初(1023)进士及第，如果说是成寻记录下来，时间上是相符的。可是，现行的《杨文公谈苑》的逸文里看不到上引“雍熙初，日本僧齋然”以下的文字。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考察朝衡即阿倍仲麻吕科举及第的史料只有《参天台五台山记》的记录。下面，出于进一步探讨的目的，不厌其烦地将《参天台五台山记》的自“齋然依录自云”以下至“开元中有朝衡者，太学应举，仕至补阙”的全文移录如下：

齋然依录自云，姓藤原氏，为真连，国五品官也。齋然善礼，而不通华言。有所问书以对之。国有五经及释氏经教，并得於中国。有白居易集七十卷。地管州六十八。土旷而人少。年长寿多百余岁。国王一姓，相传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印在史局，阅所降禁。尽有日本年代记一卷及齋然表启一卷。因得修其国史，传其详。齋然归国，附商人船。奉所贡方物为谢。案日本倭之别种也，以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言倭之名不雅改之。盖通中国文字。故唐长安中，遣大臣真人来贡，皆读经史，善属文。后亦累有使至，多求文籍释典以归。开元中有朝衡者，太学应举，仕至补阙。

也就是说，杨亿的“开元中有朝衡者，太学应举，仕至补阙”的记述是参考了齋然等带去的书籍、表启，或者是中国人所写的与齋然等的问答记录。从杨亿记述中“案”等语的使用可以看出，这些记述带着他个人的推断。对此笔者持疑，我们能凭在不能正常会话情况下的笔谈纪录等含有传闻性质的史料以及带有杨亿个人推断的史料来确定阿倍仲麻吕科举及第吗？

总之，笔者对迄今为止阿倍仲麻吕科举及第之定说持怀疑态度。理由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其他。《拙菡千百》卷二“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里有“（唐）长庆初（821），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杜师礼榜”的记载，可见，新罗人在唐代开始科举及第是在长庆初年。根据《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五“选举考·宾贡科”条，在唐代，新罗出身的科举及第者有上述的金云卿，其次有前节提到的崔致远，接着有崔慎之、崔承祐、朴充、金夷鱼、崔利贞、金叔贞、朴孝业、金允夫、金立之、朴亮之、李同、崔囊、金茂先、杨颖、崔涣、崔匡裕、金绍遊、金可纪、朴仁范、金文蔚、金渥等共23名。据同书及《高丽史》卷七十四“选举志·制举”条等的记载，唐代以后朝鲜人科举及第者宋代9人、金代1人、元代20人、明代1人。那么，金云卿等人应试的宾贡科是个怎样的考试科目呢？关于这个宾贡科，最近高明士推出了他的卓越新作。作者指出，宾贡科始于唐长庆年间，是为来自朝鲜等外国人士专门设置的特定科目。[9]另外，《拙菡千百》卷二“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条里还有如下的明确记载：

然所谓宾贡者，每自别试，附名榜尾。不得与诸人齿，所除多卑冗。钦惟圣元一视同仁，立贤无方。东土故与中原俊秀并举，列名金榜已有六人焉。

就是说，宾贡在经过元代的改革之前在科举科目中被赋予“别科”的性质，合格者的名字也被排在榜尾，任官也是多被授予卑微之职。之所以出现这种特殊待遇，我想是因为存在这么一个现实问题，即中国人以外的科举应试者和中国人以同样的标准参加考试，不利面过大，考试难以过关。但是，又很难想象那种待遇是为了优遇他们，合格者多被授予卑微官职这一点也证明了宾贡科并不是什么优遇措施。可以说，这些做法的背后存在着来自中国方面的强烈的中华意识。

阿倍仲麻吕科举及第一说是宾贡科制度还没有实行以前的事情。如上所述，自古以来在与中国文化保持更加密切关系的朝鲜，第一位科举及第者要数早于崔致远于长庆初年（821）及第的金云卿。阿倍仲麻吕倘若真的科举及第，那应该是比金云卿大约早一百年的唐玄宗开元年间的事情了。笔者所持的根本疑虑是，在当时日本人留学生和中国的士人一起接受同样的科举考试并且及第，这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

《全唐诗》卷一二七“王维三·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一诗的序文里有“卑弥遣使，报以蛟龙之锦……晁司马结发游圣。负笈辞亲……名成太学，官至客卿……”的记述，《全唐诗》卷一三七“储光羲三·洛中贻朝校书衡即日本人也”一诗里有“万国朝天中，东隅道最长。朝生美无度，高驾仕春坊。出入蓬山里，逍遥伊水旁。伯鸾游太学……”的记载，前者王维的序文认为秘书晁监即朝衡（阿倍仲麻吕）“名成太学”了，后者的“伯鸾”是后汉梁鸿的字（《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传》），依照其《传》的说法，阿倍仲麻吕曾“授业太学”。根据这两则史料，可以认定阿倍仲麻吕确实进太学学习。《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里对唐代的学制有如下记述：

（高祖）以义宁三年五月，初令国学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已上子孙，太学置生一百四十员，取五品已上子孙，四门学制一百三十人取七品已上子孙……（贞观年间）凡三千二百六十员……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於国学之内。鼓篋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

《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制上·贞观十三年（639）”条里有“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的记述。可见，在唐初有很多来自“四夷”的留学生在中国的学校里学习。该处未见有关于“倭国”、“日本”的记述。但是，《唐语林》卷五有“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受业”的记述，证明了就学于太学的日本留学生的存在。阿倍仲麻吕也曾就学于这样的太学，一般的说法是他太学毕业之后科考及第。可是考虑到前面论述的后世出现的宾贡科，朝鲜的科考合格者也仅限于现存史料的记载，并且待宾贡科出现后才开始有了合格的可能，不能肯定仲麻吕真的科举及第。关于来自四夷之地的人士参加科举考试、任官的问题，现在由于史料上的局限做更详细的论述有困难，进一步详细的探讨只好留待今后。如果说阿倍仲麻吕确实曾经科考及第的话，那么也有可能在当时也采取了与后世相似的优遇。从总的趋势看，阿倍仲麻吕也曾处在和崔致远相同的状况之下。

三、对阿倍仲麻吕来说的中国和日本

诚如先行研究已经指出的那样，《文苑英华》卷二九六有题为“衔命使本国”的朝衡（朝衡）作品（“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駉驹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以及收集于《古今和歌目录》的《国史》中的赋诗（“（开元）十九年，京兆尹崔日知荐之。下诏褒赏，超拜左补阙。二十一年，以亲老，上请归。不许。赋诗曰：‘慕义名空在，愉（输？）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被认为是少有的阿倍仲麻吕的传世遗作。[10]上引诗前段是他想回国时的作品，从诗中“天中恋明主”、“伏奏违金阙，駉驹去玉津”、“西望怀恩日”等表达来看，能够看出他对唐王朝皇帝怀有的钦慕之情。《旧唐书》卷一九九上“日本国传”条中亦有“其（日本的）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返乡，逗留不去”的记录，表述了仲麻吕对中华的钦慕。应该说这一表述同仲麻吕的遗文表达在内容上是一致的。

可是，众所周知，《隋书》卷八十一“倭国传·大业三年(607)”条里有遣隋使带给隋场帝的著名国书的记载，其曰：“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倭国对隋朝皇帝称“天子”，其背景之一是在古代日本存在着经过魏晋南北朝形成的中华意识。关于古代日本中华意识的形成问题，根据以前的拙稿[11]在前言里做了概述。也就是说，日本的中华意识在遣唐使以后也得以“顺利”强化，通过采用天皇号、采用只有统治天下的中国皇帝才能使用的年号(大化年号以后的年号)、采用日本国号，走向了完成律令制国家的道路。阿倍仲麻吕时代的奈良朝，正值日本的上述时代。阿倍仲麻吕在《文苑英华》遗文中“天中恋明主”、“西望怀恩日”表达的对唐王朝皇帝玄宗的仰慕之情，在当时难道没引发任何问题吗？就学于太学、成为唐王朝官僚的仲麻吕，难道不是有违“忠君不侍二君”之德操吗？对于此种矛盾，仲麻吕自身难道不曾有过察觉吗？对于日本委派的留学生仲麻吕的这种言行，在日本的朝廷中难道未曾有过异议吗？如前所述，中国科考中的宾贡科制始于821年，菅原道真建议费废止遣唐使是在894年。在这期间，做为日本遣唐使的随员入唐的人们应该说得到了接受宾贡科考试的机会。崔致远等来自朝鲜或波斯的考生在当地考试合格的消息传到日本，而日本考生的情况却没有传到。将这两种情况放在一起考察，可以意料这里存在着比较复杂的问题。关于其细节现在未暇详细论述，但总的趋势是，古代日本从卑弥呼以来一直想从中国册封体制脱离出去，日本的以上差异与这种大前提不能不说没有关系。

不过，在此至少能够提出以下的问题点。《日本书纪》卷二十二《推古天皇纪》有如下记载：

十五年……秋七月戊申朔、更戊，大礼小野臣妹子，遣大唐。以鞍作福利为通事……十六年夏四月，小野臣妹子，至大唐国。唐国号妹子臣曰苏因高。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从妹子臣，至于筑紫……爰妹子臣奏曰：臣参还之时，唐帝以书授臣。

古代日本称中国为“大唐”，称其政治领袖为“唐帝”。说明在古代日本还是以“大”来称呼中国，其领袖则是以“帝”来称呼的。[12]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许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发源于中国的东亚政治思想即天子承天帝之命统治天下的思想及相应的中国文明影响了日本，使之形成了自身的中华意识。当日本的中华意识得以扩张达到极限的话，就会出现日本天皇否定中国王权的正统性，主张自己是受天地之命的唯一天子这一事。

然而，《隋书·倭国传》中“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记述，在中国方面看来，仅仅是东夷之一的倭国自称“天子”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同中国持对等关系的一种主张。日本自称“天子”，并没有无视和凌驾中国之上的意思。[13]（有观点认为“日出”、“日没”在表达上有对中国显示优越之意，在此根据增村宏的意见不认为这种表达存在上下关系的差异。）

另外，众所周知，《日本书纪》是在奈良初期的720年完成的。从《日本书纪》中所见的“大唐”、“唐帝”的用语来看，《隋书·倭国传》中两国都有天子的想法基本上在奈良时代已经存在并发展了。

阿倍仲麻吕在唐王朝做官事件，发生在古代日本持有这种认识期间。正因为如此，仲麻吕在唐王朝做官未遭受日本国内的非难。《续日本纪》卷三十五“宝龟十年(779)五月丙寅”条中有“前学生純阿倍朝臣仲麻吕，在唐而亡，家口偏乏，葬礼有阙，敕赐东純一百疋、白面三百屯”一段记录，这是仲麻吕死后九年的追记。从文中可以看出，日本朝廷对仲麻吕是有过恩赐的，这种恩赐的存在是我上述观点的一个依据。

但是，821年开始的科举宾贡科的情况恐怕与上述情况不能等同。如前所述，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无意在此作详细论述。某个人偶尔受宠侥幸得以做官和遣唐使的随员参加对外国人开放门户定期举行的官僚任用考试得以做官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考虑遣唐使派遣之际，日本方面很在意不带国书，恐怕上述质的区别已经为当时的日本所充分认识了。

接下来考察一下阿倍仲麻吕对日本所怀有的感情。仲麻吕曾有过强烈的思乡之念，这可从《古今集》羁旅歌收录的著名的“遥望遥远的天空……”之歌或者从仲麻吕在开元二十一年(733)欲同以多治比广成为大使的遣唐使一同回国(参照赵骅《送晁补阙归日本国》)、天宝十一载(753)欲同以藤原清河为大使的遣唐使一同回国这些举动(参照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窥见一斑。他的思乡之念也许仅仅表达为诗文的形式，也许是出于回国的衣锦还乡，有如崔致远在新罗使节面前洋洋自得的那种心情。但是，本人认为仲麻吕的思乡之念的确是超出抒情的非常强烈的感情。其佐证之一是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的序文里的“名成太学，官至客卿。必齐之姜。不归娶于高国。在楚犹晋，亦何独于由余”这一段记录。这里的“必齐之姜。不归娶于高国”出自《诗经》“陈风·衡门”里的“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后汉的郑玄对之作作了“此言何必河之鲂，然後可食。取其口美而已。何必大国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贞顺而已……齐姜姓”的笺注。也就是说，王维在诗中引用《诗经》“岂其取妻，必齐之姜？”一句，暗示了第二次想要回国的仲麻吕，到这个时候为止还没有娶大唐女子为了妻。此时的仲麻吕应该已经是56岁了。遣唐留学生仲麻吕到达长安是在玄宗开元五年(717)20岁的时候，就是说仲麻吕入唐30多年以来居然没有娶妻。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其详因尽管现在还不能作答，但从仲麻吕不娶大唐女子的选择能够揣度其思乡之念的强烈程度。回过头来看前面内容，仲麻吕73岁死于长安，《续日本纪》在9年后对其死后的情况作了“前学生阿倍朝臣仲麻吕，在唐而亡，家口偏乏，葬礼有阙，敕赐东純一百疋白棉三百屯”的追记。如果依据该史料，那么仲麻吕是有“家口”的。同《续日本纪》卷五“和铜四年(771)十月甲子”条里有“凡私铸钱者斩。从者没官，家口皆流”的记述。“家口”指的是除家庭主人以外的其他成员。那么，仲麻吕“家口”的实质又是如何呢？如果这个“家口”是仲麻吕入唐时离别的在日亲属或者是其子孙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这个“家口”中包括仲麻吕的亲生子女则与前面的说法是有龃龉的。这样的话，应该如何看待这种龃龉呢？前面的讨论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应该考虑那些孩子是妾之所生。因为仲麻吕在唐没有正妻，这样考虑也许合乎情理。还有所说的“葬礼”，那么这个葬礼是在哪里举行？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诸如此类，不明了的问题很多，仅凭以上零散史料不得不说很难搞清。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传·日本国”条里，关于阿倍仲麻吕有这样的记述：

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天宝十二年，又遣使贡。上元中，擢衡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

仲麻吕任镇南都护是在60岁出头，回长安赴任则是到了70岁以后的事情。因此，也有意见认为安南赴任的史实不存在。可是，本文按照杉本直治郎的意见认为安南赴任确有其事。[14]这样，对于思乡之念强烈却两次错过回国机会的仲麻吕来说，到遥远的“南蛮”之地安南赴任确实是过于残酷了一点。这同29岁青年时回国的崔致远相比，虽说仲麻吕比之崔致远更受皇恩“优遇”，可是作为“异国”之人，置身宦海的孤独感应该是很强烈的。

四、后世对阿倍仲麻吕、崔致远的评价和国制的变迁

成书于12世纪的《江谈抄》在卷三“阿倍仲麻吕咏歌”里有如下记述：

仲麻渡唐之后不归朝，于汉家楼上饿死。吉备大臣后渡唐之时，见鬼形，与吉备大臣谈，相教唐土事。仲麻不朝人也。

相传仲麻吕饿死于中国并成了鬼，虽然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说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2世纪开始出现如“不朝、饿死他乡、成为鬼”之类否定形象的说法。此外，18世纪初的《大日本赞藪》“阿倍仲麻吕传赞”里对仲麻吕公开非难：

慕唐之文物，留而不归。易姓名、受官爵，是蔑祖先而二本也。岂圣贤之道也？世徒眩于才藻，不究其本，而歆艳其为唐廷文士所推奖，过矣。

此外，藤田东湖(1806-1855)在《东湖歌话》中“遣唐使饯别歌”里，将仲麻吕和成寻的母亲作了比较：

僧人成寻赴唐之时，其母告诫说：“唐国也是天之下之国，但不能忘却日出之国(日本)啊”。其情深沉，其辞巧妙，而且道出了上下内外有别之理，虽说是女人却不逊男人。而阿倍仲麻吕等辈，入唐随俗，忘却日出之国，成为李隆基的臣民，形为男儿

身，心志却远如一老嫗。

强烈地认为仲麻吕是耻辱的存在。这种抨击虽然是水户学派中国粹主义高涨时的产物，但是对了解后世日本怎样看待仲麻吕是一种颇有意思的记载。

那么，在本文中作为比较对象的崔致远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第一节的最后已经指出，朝鲜李氏王朝前期仿照中国的《文选》编纂的朝鲜汉文学集大成之《东文选》里，新罗人的作品多达192篇，其中崔致远的作品就占据了146篇。相反，流传至今的阿倍仲麻吕的遗作却寥寥无几。同盛唐时期的名流王维等有过交往的仲麻吕，从其遗作收载于《文苑荣华》的程度来看，其多数杰作看来是散佚了。对于这样的结果可以认为是二人的偶然不同，但是笔者认为这一结果明显地象征着二人所处的政治环境之不同。崔三龙（韩国）在题为《崔孤云传的主题和民族意识》一文中对之作如下论述：

壬辰、丙子两乱过后，到了十七世纪后半叶，进入对外来民族压迫所致屈辱的反思时期，此时出现了新的民族觉醒。这个时期问世的北崖子的《揆园史话》，被数为代表民族史学的仙家史书……故事形式的写作是《揆园史话》的编纂特色，书中对大国中国夸示我同胞的优越性，从中看得出反中国的历史意识。反中国的历史意识作为道家持有的独特的历史观，它表明了坛君的实际存在、东夷文化的优越和民族历史的悠久性。北崖子在《坛君记》中引用崔孤云（致远）的《鸾郎碑文》，称崔致远由于精敏，在学习文章上出类拔萃，不仅博古通今，名声也很显赫，其言语多反映先圣垂训之精华，认为崔致远远得上古以来流传下来的风流思想，对其推崇备至……韩日合邦以后，吾民族再次受到日帝统治，崇拜坛君的大宗教兴起，《天符经》得以介绍。桂廷寿在所著《天符经》文（1917）里称，进入太白山发现岩壁上刻有天符经，高兴的是那是关于坛君的珍贵遗物，同时又见到孤云先生的遗迹。对此，金永毅在《天符经注解》中解释说，坛君的天符经是用篆字刻于碑石，崔文昌侯孤云解其文字，刻之于太白山。崔致远的《鸾郎碑序》，其著述的根据虽可靠，但解答《天符经》一说却很难令人信服。可是，至今为止崔致远被民族主义者当作宣扬我民族精神的人物加以尊崇，这告诉我们不能将他看作事大主义者。[15]

此外，也有说《揆园史话》是近代的一部伪书。所以说，崔三龙的上述见解还不知是否妥当。如果凭崔致远的文章多收录于《东文选》以及在现今的韩国也属倍受尊崇的人物的事实的话，应该说他确实是在朝鲜很早以来就受到人们尊崇的人物。

那么，在古代东亚相似的环境中，对阿倍仲麻吕和崔致远的评价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差异呢？解答这个疑问需要分析多种因素，不能引出单纯的结论。对二者的评价之所以出现差异，笔者认为在日本和韩国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所持的认识不同是其诸多因素中重要的因素之一。下面试论本人的看法。

《太平广记》卷四八一“蛮夷二·新罗”条里有这样的记述：“吾虽夷狄之邦，岁有习儒者，举于天阙，登第荣归，吾必禄之甚厚。”这段话记述的是中国商人马行余飘流到新罗时新罗王之所言。此外，引自《燃藜室记述别集》卷九“官职典故·科举一”的《芝峰类说》中记述说：

我国贡士不得赴举於天朝者，以洪沦（人名）弑君，金义杀使之故也。在我朝固无干焉。若举此请之，则天朝无不从之理。我国人握龔无奇节，不喜远游。故至今蒙此恶名，而不得齿於宾贡，可胜叹哉。许筠尝於贾郎中维钥，言安南、琉球皆赴举，安南人陈儒，正德间（明武宗）中第，官右都御史。阮鹗嘉靖年登第，为工部右侍郎。

这是慨叹李氏朝鲜时期，因“弑君”之故不能从朝鲜赴明参加贡宾考试。另外，又列举琉球、安南等地赴明参加科举及其及第者，叹息之中流露出了一种焦灼。在这一点上与前述藤田东湖等对阿倍仲麻吕的评价有对比鲜明的不同。《高丽史》卷七四“选举志·制举”条里有“大明颁科举诏，令就本国乡试，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数选取”的记述，说明在明代朝鲜已经准许在本国举行乡试。这已经超出了一个属册封国另一个属非册封国的水准界限，表明了中国和朝鲜关系之深厚。下面是桃裕行氏《上代学制的研究》[16]关于日本古代学制的论述：

（1）“从大学寮举送到太政官的大学举人同日本国内的贡人一同参加式部省举行的国家考试。这个国家考试的科目是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四科。”（第25页）

（2）“国家考试合格者，秀才的上上第是正八位上，上中是正八位下。明经上上是正八位下，上中从八位上。进士甲是从八位下，乙以及明法甲是大初位上，乙叙位大初位下。”（叙迁令）（上书第27页）

由此可知，在日本的古代也仿照中国之制采取了对学生和贡人进行考试，以合格者任官的制度。但是，该书又指出：

（3）“学制与科举制紧密结合，是从地方广大士族或读书人阶级中录用官吏的一种手段，但在我国却没有与这种学制相对应的广泛的阶层……律令制的推行虽然在进入平安时代之后也没有停止过，但仅有其形骸一直存续到后代。平安时代实行的主要是以格式为中心，以藤原氏为主的贵族出现在政治前台。”

（4）“作为学制精神的人才录用主义在中国原来也仅局限于士族阶级范围之内，在我国也没有像中国那种规模的阶级，它只施用于相当有限的范围。氏族集团势力得以加强之后，开始出现官位世袭倾向，人才录用制度更加有名无实了。”（上书第252页）

如上所述，我国没有像中国那样广泛的读书人阶层，人才录用制度渐趋有名无实。这一点上，新罗的元圣王四年（788）仿照唐制开始由科目选拔人才（这个被称为读书出身科或读书三品科），高丽光宗（958）时，接受中国——后周人双翼的建议开始施行科举制，以后文科的乡试、会试（监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等渐趋完善，科举制在朝鲜被采用并最终扎下了根，直至1894年甲午改革时被废止。可见，日本与朝鲜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17]笔者认为，朝鲜和日本国制的不同是导致对阿倍仲麻吕和崔致远的评价不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结语

通过本文，笔者澄清了以下几个问题：

（1）古代朝鲜和日本对“天下”的认识上存在着差异。朝鲜的“天下”包含中国和朝鲜的概念，日本的“天下”则是以日本为中心，包含的实际领域基本上是在日本一国。

（2）在朝鲜，尽管它是中国的册封国，但是中华思想以曲折的形式存在过。

（3）成为唐王朝官僚的崔致远一方面将本国君主——新罗王置于唐王朝皇帝以次的地位。

（4）崔致远虽然常谦称自己为“东海一布衣”、“万里远人”等，但他怀有作为新罗人的矜持。

（5）崔致远或阿倍仲麻吕等非汉民族留学生，在中华思想下或多或少意识着自己是“夷狄”，同时他们强烈感到到自己被视为“夷狄”。

（6）阿倍仲麻吕入太学的事实能够确认，但是对科考合格而且是进士科合格的说法，至今论据不够充足。就算是科考合格，很有可能也是后来的类似贡宾的其他科考形式。

（7）阿倍仲麻吕成为唐王朝的官僚，可以说是处在一个“侍二君”的局面，对此很难说他自身或当时的日本朝廷没有一点看法。不过，在当时还没有像后来日本出现的针对中国的那种强烈的民族主义主张，就算当时有那种认为中国和日本各自都是中华的看法，但与任官的可否好像并没有多大关系。

（8）阿倍仲麻吕直到晚年还怀着自己是日本人的强烈意识。这从仲麻吕在唐期间没有正娶得以印证。

（9）对阿倍仲麻吕和崔致远这两个成为唐朝官僚的人物，各自的出身国后来的评价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来自二人各自国家体制或历史的不同。朝鲜是中国的册封国而日本不是，两国对科举制度的接受也不相同，这就决定了评价出发点的不同。

以上是本稿的基本概要。本稿指出的问题中，仍然有论证上的不足之处，仍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究。另外，在遣唐使阶段日本国家意识的实质、遣唐使和朝贡使的不同、遣唐使废止的意图等与本稿关联的问题还有很多。这些问题我想留待今后再来考察。

作者简介：川本芳昭，九州大学研究生院教授，主要从事东亚古代、中近代史研究。

- [1] 1979年7月，西安市在庆兴公园建造了“阿倍仲麻吕纪念碑”，碑左面刻李白《哭朝衡诗》，右面刻阿倍仲麻吕《望乡歌》，汉译全文如下：“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编者注。
- [2] 拙稿《漢唐間「新」中華意識の形成—古代日本・朝鮮との関連をめぐって—》，载《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0号，2002年。本稿原为2000年度九州史学会（2000年12月于九州大学召开）公开讲演时的同题报告，另于2001年8月在山西大同召开的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为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七届年会上发表报告，题为《漢唐間新中華意識の形成—五胡・北魏同古代日本・朝鮮の關係—》，经修改后收入论集。
- [3] 拙稿《漢唐間「新」中華意識の形成—古代日本・朝鮮との関連をめぐって—》，第3-7页。
- [4] 关于这一点，参照桑野荣治：《高麗から李朝初期における円丘壇祭祀の受容と変容》，《朝鲜学报》161辑，1996年；《朝鲜小中华意识的形成と展开—大报坛祭祀の整備过程を中心に—》，朴忠锡、渡边浩编《国家理念と对外認識—十七—十九世紀—》，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第149—185页，2001年；以及参照该论文掲載的有关论考。
- [5] 参照拙著《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汲古丛书16，汲古书院，1998年，第28-33页。
- [6] 参照杉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吕伝研究 朝衡伝考》，育芳社，1940年，第322—324页。
- [7] 参照砺波护：《隋唐の仏教と国家》，中央公论社，1999年，第24页。
- [8] 参照王勇：《唐から見た遣唐使—混血児たちの大唐帝国》，講談社選書メチエ125，1998年，第73页。
- [9] 参照高明士：《宾贡科成立与发展——东亚士人共同出身法的探索》，《唐代史研究》5号，2002年。
- [10] 参照杉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吕伝研究 朝衡伝考》，育芳社，1940年，第157、226页。
- [11] 参照拙稿《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汲古丛书16，汲古书院，1998年。
- [12] 遣隋使阶段的中国王朝是隋，《日本书纪》将隋之后的唐也称为隋了。
- [13] 参照增村宏：《遣唐使の研究》第一编《遣隋使問題の再検討》，同朋舍，1988年。
- [14] 参照杉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吕伝研究 朝衡伝考》第二编《安南に関する朝衡》，育芳社，1940年。
- [15] 参照崔三龙：《崔孤雲伝の主題と民族意識》第三节，《国語文学》，全北大学，1985年。
- [16] 参照桃裕行：《上代学制の研究》，《桃裕行著作集》第一卷，思文阁出版，1994年。
- [17] 参照矢木毅：《朝鮮における進士概念の変遷》，《东洋史研究》54-3，1997年；山内弘一执笔，伊藤亚人、武田幸男监修《朝鮮を知る事典》，平凡社，1986年，第35页

计数器：214255 设为首页 加入搜藏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